

林语堂共情翻译观下的《浮生六记》

闫瑞芳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 济南 250353]

摘要: 学界对林语堂翻译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 深入分析其译作文本翻译策略或深度解读其译论文章《论翻译》。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林语堂的译作《浮生六记》, 辅以其译论文章《论翻译》来解读林语堂的翻译思想。通过分析林语堂在《浮生六记》中对目标读者的共情、对源文本的共情, 以及对原作者的共情三重关系的情感译论话语, 探讨林语堂的共情翻译观, 并追踪其形成原因, 力证共情翻译观对林语堂传播中国文化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

关键词: 林语堂; 《浮生六记》; 《论翻译》; 林语堂共情翻译观

中图分类号: H315.9;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832-9317 (2023) 04-0043-5

DOI: 10.12424/HA.2023.063 **本文链接:** <https://www.oc-press.com/HA-202304-043.html>

一、共情的内涵

英文为 Empathy, 该词源于 1873 年德国美学家费肖尔 (Robert Vischer) 创造的 Einfühlung 一词, 用于描述美活动中人格与对象的完美融合, 意为“移入情感”。国内相关研究虽然将该 Empathy 一词汉译为移情、同情、共情, 同理心, 神入等。共情不是简单的转移情感, 而是共情者与被共情者本心的自然呼应或共鸣, 强调的是共情者与被共情者共同拥有或分享某种情感与感受设身处地地感同身受。

关于“共情”一词, 中国学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南朝的刘勰提出了“登山则情满于山, 观海则意溢于海”, 把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合到客观事物中去。近代文学理论家王国维建立的“境界说”提出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共情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触景生情、感物释怀, 通过对事物的移情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二是通过对情感的知觉而产生与他人的情感相接近的情感体验或共鸣。

二、林语堂与“共情翻译观”

虽然在众多著作中, 林语堂并未用“共情翻译观”来描述自己对翻译的见解, 但可以概括其翻译观的《论翻译》一文中, 字字句句却都在流露出一

己的“共情翻译观”。对待翻译这一艺术, 必赖个人相当之艺才及其对于该艺术相当之训练, 此外别无捷径, 毕竟, 艺术素来都是没有成功捷径可言的。林语堂认为翻译不是复制, 而是创作, 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 就是翻译是一种艺术。进行翻译创作时, 译者要与源文本情感相通, 才能译出好的作品。译者能做到感同身受, 读者才能身临其境。

关于翻译标准问题, 林语堂认为大概包括三个方面: 忠实, 通顺和美。忠实通顺可以用严复的“信达”二字来概括, 但美的标准是一个“雅”字所远远不能概括的。译者不仅要对原著作者、目标读者负责任, 更要对翻译这门艺术负责任, 这样才具备真正译家的资格。翻译的问题在于译者心理和所译文字之间的关系——先研究字义的性质, 然后断定字译方法是否可行; 先研究行文的心理, 然后断定译者翻译时应采取的态度。

林语堂说, 原著作者并非陌生人, 而是与他心意相通、情投意合的老朋友, 唯有能够和原著作者情意相通的译者才能翻译得好。因为译者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语言文字替原著作者发言, 如果两者不像是老朋友一样, 这怎么能办得到? 也正是与

作品的这种共情，促成了《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英译重编传奇小说》（*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等作品。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深厚情意和对中西受众的善解人意在林语堂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中，“共情翻译观”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所著的一部自传体随笔。他以清新脱俗的文笔，记述了与妻子的闺房乐趣、家庭变故、闲适情趣、山水游记等，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作者夫妻间的情深意笃以及历经人生磨难仍然热爱自然、求真求美的精神境界，表现出作者的本真心灵和自然天性生动地写出了他人生的真体验、真性情。

林语堂时第一个把《浮生六记》译为英文的人。《浮生六记》所反映的崇尚个人主义和闲适生活的家庭观念与林语堂理想的家庭生活模式产生了共鸣。并且，他通过译文将这对中国夫妇的生活艺术介绍给西方读者，受到备受当时受累于快节奏生活而又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读者所向往。

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兼顾原著的文字含义和文体风格，以饱含的感情、温柔的语调，如珠似玉的词汇，把其中包含的“声音之美、意义之美、传神之美、文气文体形式之美”等多重美感用生动地道的英文贴切地表达出来，将沈氏夫妇的恬淡可爱生活呈现给西方读者，带给西方读者淡泊、闲适、浪漫和美好的阅读感受，也最终成就其译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四、共情翻译观下的《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有多个译本，笔者以1939年版本和1942年版本为例，阐释林语堂的共情翻译观。1939年，为了向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士及懂外语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英语学习者，传递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1939年译本以双语对照形式出版。这一译本不仅“让世人略知晓一对中国夫妇简朴而快乐的生活”以及“由偶然结为夫妻的两个人所经历的真实的中国式人生的奥义”，并为国内英语学习者提供英语学习和翻

译的范例。1942年译本是林语堂在美国重新翻译的，被收录在兰登书屋出版的《中国与印度的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中。由于其目标读者是西方人士，自然而然，林语堂站在他们的角度来了解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古老的国度。通过此书，西方读者了解东方的神秘帷幕，了解了中国智慧，了解了中国人看待事物的一些基本方式。

笔者从对目标读者的共情、对源文本的共情及对原著作者的共情三方面，分析林语堂共情翻译观在其两个译本中的体现。

（一）对目标读者的共情

1939年版本的《浮生六记》为全文翻译，而在1942年版本中，林语堂则进行了选择性翻译。根据李平（2020）统计，1939年版本有45408个单词，1942年版本有39140个单词，删减部分集中在第四章。林语堂（1942）在《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中写到他对文章进行选择性翻译是因为认为有些部分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外国读者难以理解。

在1942年版本的《浮生六记》中，林语堂主要对第四章“浪游记快”进行了选择性翻译，对比被删减的部分，笔者发现其中有很多文化内涵丰富的内容。

例子中1939年版本简称1939，1942年版本简称1942。

例1 余患其扰，先一日约鸿干赴寒山登高，藉访他日结庐之地。

1939: Knowing of this beforehand, and disliking the noise and confusion, I had arranged with Hungkan to go to the Hanshan Temple that day and climb high mountains [as was customary on this festival], incidentally looking for a place for retirement.

例2 芸曰：“肥者有福相。”余曰：“马嵬之祸，玉环之福安在？”

1939: “But a plump person has good luck,” replied Yun. “What about the fat Yang Kueifei who died at Mawei?”

例3 东坡游此作二赋，指为吴魏交兵处，则非也。

1939: Su Tungp'o wrote two fu-poems when he

visited this place, but through an error, referred to it as the scene of the river battle between the Wu and Wei Kingdoms.

例 1 中前文有“重九日”的叙述，在中国文化中，重九日有登高的习俗，所以此处才有登高之说，1939 年版本在括号里对相关信息进行了简要说明：“结庐”源自陶渊明《饮酒·其五》中的“结庐在人境”，也是典故。例 2 中涉及杨玉环及马嵬坡之乱，译文的目标读者若不知晓杨玉环的故事以及她丰腴的体型特征，势必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例 3 叙述的地点是黄州赤壁，苏东坡前后两次泛游赤壁，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即例中所谓“二赋”。“吴魏交兵处”指赤壁之战，即指东汉末年孙权、刘备联军在长江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的著名战役。原文中的这些典故如果不加详细的注释，译文目标读者势必一头雾水。1939 年版本针对的目标读者是懂外语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英语学习者、生活在中国的西方读者，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在译文中译出这些典故，并采取加注的方式，在进行文化传播的同时，也让目标读者更好地了解了中国文化。在《浮生六记》1942 年版本中，针对的是西方读者，林语堂将此部分晦涩难懂的典故删除，在不妨碍西方读者了解中国通俗文化的同时，也尊重了文化差异。

此外，林语堂针对不同的目标读者，结合其思维方式的不同，对称谓等进行了差别翻译，从而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

例 4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

1939: In the winter of that year, one of my girl cousins (the daughter of another maternal uncle of mine)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1942: In the winter of this year one of my girl cousins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例 5 有同伴携妾回者，曰徐秀峰，余之表妹婿也。

1939: ...there was a boy cousin-in-law of mine, by the name of Hsü Hsiufeng, who had brought home with him a concubine.

1942: ...there was a cousin of mine, by the name

of Hsü Hsiufeng, who had brought home with him a concubine.

中国文化中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在汉语中，称谓系统比英语中的复杂得多，文化内涵也更加丰富。与之相对，西方人没有严格区分亲属关系称谓的概念，林语堂基于尊重文化差异，有意地淡化或忽视中国文化中家族文化的差别。例 4 中，1939 年译本对“堂姊”加了文内注 (the daughter of another maternal uncle of mine)。而在 1942 年译本中，译者将“其堂姊”直接译为“one of my girl cousins”，没有解释或加注说明是父系还是母系的亲属。例 5 中的“表妹婿”在 1939 年版本中被译为 a boy cousin-in-law 本来就有所省略（未注明是母亲这边），1942 年版本则干脆译为 cousin，符合英语的习惯用法，这也符合西方读者崇尚个人主义、不受家庭观念束缚的自由精神。林语堂本着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目的，简化亲属关系称谓，去除了中国习俗的文化障碍，从而让西方读者对源文本中蕴含的中国文化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二) 对源文本的共情

对于一些删除影响源文本意思传达的文化负载词，林语堂则采用变通的翻译策略。从而使译文更准确地传达原著作者意思。

例 6 临门有关圣提刀立像，极威武。

1939: At the door, there was a most imposing standing figure, representing General Kuan Yü, the Chinese God of War and Loyalty, holding a huge knife in his hand.

1942: At the door, there was a most imposing standing figure, representing the God of War holding a huge knife in his hand.

例 7 入门经韦驮殿，上下光洁，纤尘不染，知为好静室。

1939: Entering it and passing through the Hall of Weit'ou the Swift-footed Buddha [defender of Buddhism against devils], I was struck by the extreme neatness and cleanliness of the place, and realized that its owner must be a person who loved quiet and solitude.

1942: Entering it and passing through the first hall, I was struck by the extreme neatness and cleanliness of the place, and realized that its owner must be a person who loved quiet and solitude.

例 6 中的“关圣”指关羽，是国内妇孺皆知的人物。1939 年版本不仅音译了关羽的名字，还对人物内涵略有解释。1942 年版本直接用 the God of War 代替，例 7 中的“韦陀殿”涉及佛教人物，1939 年版本进行了双重补偿 (the Swift-footed Buddha [defender of Buddhism against devils])，1942 年版本则删除了这个人物形象，直接译为 the first hall。由此可见，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目标读者，1939 年版本相对忠实，注重译文的准确性；1942 年版本则比较灵活，注重可接受性，淡化删减现象随处可见，尊重了文化差异。林语堂在进行两个版本的创作时，虽然采取的译法有所不同，但都减轻了读者的阅读负担，且不妨碍源文本意思的传达。

例 8 是年九月，余从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庆府之任。

1939: In the ninth moon of the same year, I accompanied his honour Shih Chot'ang on the voyage to his office at Chungking in Szechuen.

1942: In September of the same year, I accompanied His Honour Shih Chot'ang on the voyage to his office at Chungking in Szechuen.

例 9 重阳日，邻冢皆黄，芸墓独青。

1939: On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Day, I found that, while all the other graves were yellow, hers was still green.

1942: On the festival of 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moon, while all the other graves were yellow, hers was still green.

例 8 中的“九月”1939 年版本译为 the ninth moon，1942 年版本译为 September，这种处理虽然与原文的时间并不严格对应，但更有利于读者接受，照顾西方读者的文化习惯。1942 年版本中大部分的月份都进行了这样的替换，如 the first moon 替换为 January，the third moon 替换为 March，the twelfth

moon，the last moon 替换为 December 等。但林语堂并未把所有的日期都进行这样的替换，对于一些中国传统节日的英译仍保留了诸如 the ninth moon 这样的译法，如例 9 中就修改了“重阳日”的译法，把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Day 改成了 the festival of 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moon。这样的改译一定程度上明确了重阳节的日期，可接受性也随之增强。

(三) 对原著作者的共情

例 10 余深然之。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沦亡。

1939: Now the place is still here, while my bosom friend is dead.

1942: Now the place is still here, while the one who knows my heart is dead.

例 10 中的“知己”指沈复逝去的妻子芸。1939 年版本中的 bosom friend 与“知己”经常互译，然芸亦妻亦友，但在这个语境中单纯将其译为朋友身份的知己似乎不太合适。1942 年版本意识到这一不足，将“知己”一词译为“the one who knows my heart”不仅可以表达出原文所指的“知己”之意，更能突出夫妻二人心心相印的款款深情。林语堂站在原著作者的角度，以与原著作者情意相通朋友的身份，窥探原著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通过自我校对的方式，使得译文真实细腻却又不失准确的表达沈复与芸的岁月缱绻。

例 11 芸曰：“死生有命，无多虑也。”

1939: “Oh! I shouldn't worry about that,” she said. “It's all a matter of fate how long one is going to live!”

1942: “Oh! I wouldn't worry about that,” she said. “It's all a matter of fate how long one is going to live!”

例 12 我非公，死填沟壑矣！

1939: Were it not for you, I would have died long ago in the gutter.

1942: Were it not for you, I should have died long ago in the gutter.

这两例涉及虚拟语气的用词，其中 should 的语气要比 would 强烈一些，并且语义重点也略有不同。

例 11 中芸意在表达生死不是人所能控制的, 所以无须忧虑, 语义偏向人的主观行为, 语气也比较平淡, 因此 1942 年版本中的 would 更为合理。例 12 是一位曹姓者所言, 其落难时曾蒙沈复出手相助。1942 年版本中的 should 强调的是一种客观结果, 语气也比较强烈, 似乎更能表达曹姓者对原著作者的感激之情, 与原文语境也更为契合。结合不同语境, 林语堂以原著作者视角, 通过译文的自我修改, 更加精准地表达出沈括想要传达的人物语气和神态。

五、结语

在翻译《浮生六记》中, 林语堂基于自己对翻译的独特见解, 更鉴于对中西目标读者、对源文本及原著作者的共情, 与其说是翻译, 更不如说是创出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这一佳作。林语堂做到与源文本情感相通、与原著作者感同身受, 目标读者切实身临其境。*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传播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美学, 让世人略知晓一对中国夫妇简朴而快乐的生活, 传神地刻画了“芸”这个“这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我们要学习林语堂的“译者不仅要要对原著作者、目标读者负责任, 更要对翻译这门艺术负责任”, 这样才具备真正译家的资格。

参考文献

- [1] Lin Yutang.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9.
- [2] 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2.
- [3] 董为国. 世易时移, 译由境生: 《浮生六记》林语堂两个译本之比较研究 [J]. 英语广场, 2020(10): 10-13.
- [4] 冯全功, 王娅婷. 林语堂《浮生六记》自我改译研究——基于两个英译版本的对比分析 [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28(05): 109-120+160.
- [5] 李平. 林语堂翻译研究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6] 李小静. 翻译是一种艺术——从《论翻译》看林语堂的翻译思想 [J]. 英语广场, 2017(05): 16-17.
- [7] 唐瑛. 林语堂共情翻译观的副文本考证 [J]. 外国语言与文化, 2022, 6(02): 93-102.
- [8] 肖福芳, 申荷永. 论 Empathy 的翻译及其内涵 [J]. 心理学探新, 2010, 30(06): 18-20.
- [9] 俞玲. 从《浮生六记》译本看林语堂翻译思想 [J]. 海外英语, 2019(14): 67-68.

A Study 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on Lin Yutang's View of Empathy in Translation

Yan Ruifang

Abstract: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thoughts have been mainly studied in two ways in the academic field: by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his works or interpreting his essay *On Translation* systematicall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of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combined with his essay *On Translation* to interpret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thoughts. By analyzing the triple relationship of empathy for the target reader,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author i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this paper discusses Lin Yutang's view of empathy in translation and goes further to study the causes of its formation so a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view of empathy in translation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hi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Lin Yutang;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On Translation*; Lin Yutang's view of empathy in translation